

# 赵孟江苏碑刻作品考辨及其书法特色

王菡薇<sup>1</sup>

**【摘要】**碑刻文献除了兼具文学、史学和金石学研究价值外，还具书法价值和审美意义。元代书坛领袖赵孟在江苏一带书写了数量颇多的碑石，不仅楷书，行书、草书在当时的碑刻中也时常出现，对元代及后世碑刻书法影响深远。本文初步厘清了赵孟所书江苏碑刻的时间脉络，将之分为早期（1308年之前）、中期（1309-1315）和后期（1316-1322）。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碑刻书法的史料价值与风格特征，勾勒出赵孟在江苏的书碑活动及其特点。这些书碑活动成为赵孟在江南儒学、理学气氛下成长和交往的见证，是赵孟艺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赵孟 江苏碑刻 《江苏金石记》 《集王圣教序》

碑刻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比之其他类型的传世文献，江苏碑刻文献主要具有三大特点：首先，时间跨度大。江苏碑刻文献从秦汉时代开始，有《刘厉王胥宫殿记残石》《校官碑》《禅国山碑》《天监井阑题字》《瘞鹤铭》《栖霞寺明徵君碑并阴》等数百种，留存了丰富资料。其次，覆盖范围广。江苏省现存碑刻文献涵盖了政治、经济、人物、民俗、教育、地理等各个方面内容。以元代为例，有文教事业碑《学校拨田地圣旨碑》、德政碑《无锡州重建谯楼记》、题记《张公洞周绪等题名》、文学作品《范文正公伯夷颂》、图像《碑阴瑞竹图》等百余块，构筑了元代社会的文化场景。再次，真实可靠性高。碑刻文献由于材质和制作的特殊性，其原始性和真实性向为学界所重。此外，江苏省现存重要的碑刻所保留的文字具有较高的书法史价值。这些碑刻文献扩展了书法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就元代而言，江苏就有蔡纪《昭灵侯祠记》、贡奎《镇江路儒学增养士田租记》、王克敬《新修平江路学记》、苏天爵《重修周将军祠宇记》等碑刻书法作品。元代书坛领袖赵孟（1254-1322）书丹的碑刻在这些作品中意义尤为显著。

## 一、赵孟江苏碑刻书法的价值和书碑缘由

在元代，赵孟作为影响较大的书法家书写了较多碑石。被梁启超称为兼具“考证经史”“研究文史义例”“讲鉴别”而“集诸派之长”<sup>[1]</sup>的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在《语石》中说：“宋人书长于简札，而不宜于碑版，至赵文敏出，重规叠矩，鸿朗庄严，奄有登善、北海、平原之胜，有元一代丰碑皆出其手。前贤谓韩文‘起八代之衰’，余谓赵书亦起两宋之衰。溯其生平，游历五朝，年登大耋，自至元以迄至治，所书碑版照耀四裔。”<sup>[2]</sup>叶昌炽对碑刻品评不随波逐流，有独到见解，且先后搜罗赵孟所书碑版不下五十通，因而他对赵孟书碑的艺术判断颇具说服力；叶昌炽将赵孟碑刻书法与韩愈文章并论，对赵孟碑刻书法给予了积极评价。宋代石刻基本沿袭唐代石刻形制，但书法方面却渐乏生机。至元代，赵孟因其书法造诣和书坛地位改变了原本的发展曲线，其书风成为江南士人学习和讨论的对象。据王连起考验，赵孟的书碑刻石，可见者已超过百种<sup>[3]</sup>；王祎则云“近百种之多”<sup>[4]</sup>。统计数据稍有出入，但赵孟在元代书写大量碑版却是事实。就现存赵孟江苏碑刻而言，就有《居竹记》《松江宝云寺记》《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吴江重建留珠兰若碑》《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江浙尚书省札付碑》《大报国圆通寺记》《乾明广福寺重建观音殿记》《崇禧万寿宫记》《平江路重修儒学记》《光福重建塔记》《长春道院记》《姑苏能仁庵记》等三十余种。

赵孟书碑众多，究其缘由主要有三。首先，书法成就。时人慕赵孟书法之美，求书者甚众。如：“吴兴八俊”之姚式（1260-?）跋赵孟《过秦论》云：“子昂善书名世，求者纷至。”<sup>[5]</sup>诗人方回（1227-1305）也云：“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侯掷缣帛；门前

<sup>1</sup>作者简介：王菡薇，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19ZD19）、江苏艺术强省建设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研究项目、南京师范大学江苏书画艺术研究中心研究项目、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培育资助项目“江苏碑刻文献与书法研究”（JY-040）阶段性成果。

踏断铁门限，苦向王孙觅真迹。”“如池如沟弃残墨，如塚如陵堆败笔。”<sup>[6]</sup>记载都颇为生动。其次，为官经历。大德三年（1299年）八月，赵孟任“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sup>[7]</sup>，直至至大二年（1309年）。其间，赵孟以其才学、社会地位、宦宦生涯赢得江南士人的认可，求书碑刻者也越来越多。在多年为官生涯中，书法研习始终与之相伴，鬼谷岩前观“唐文字字奇”，轻拂苍藓“细读老君碑”<sup>[8]</sup>。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赵孟体悟到书法较功名更可畅神，亦可达到传世之功效。可想而知，当赵孟领略前贤碑刻书法时，作为官员和书法家，他也曾构思着自己将可传世的碑刻书法，因而也才发出“古来名刻世可数，余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风传万古，须如明月印千江”的感叹。再次，儒学石刻的大量涌现。以江苏各地为例，《江苏金石记》所载元代相关儒学石刻就有《崇奉孔子谕旨碑》《崇奉孔子圣旨碑》《常熟县加封孔子制诰碑》《谕内外尊奉孔子诏碑》《丹阳县加封孔子制诏碑》《句容县儒学田籍记》《加封明道伊川制》《新修平江路学记》《句容县恭刻制词记》《扬州路学田记并阴》等，儒家学者被加封和有关学田管理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儒学教育的关注。至元六年（1269年）四月，元世祖下诏，要求提刑按察司“劝课农桑，问民疾苦；勉励学校，宣明教化”，还强调“事有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盖学校者，风化之本，出治之原也”，并言明“学校之设，有名无实，由是吏民往往不循理法，轻犯宪章，深不副朝廷肃清风俗宣明教化之意”的状况，因而“移文各路遍行所属，如遇朔望日，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讲学，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选择有德望、学问可为师长者于百姓农隙之时，如法训导，使长幼皆闻孝悌、忠信、廉耻之言，礼让既行，风俗自厚，政清民化，止盗息奸”<sup>[1]</sup>。此外，元代文人也记述了元朝“六七十年之间，所在学校，诵声相闻”<sup>[2]</sup>的情形。这些记述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关注地方儒学教育的态度。尤其在江南，儒家文化繁盛。不难推测，作为汉人、儒者、朝中要员的赵孟，被要求书写相关碑文，也在情理之中。除却上述三种缘由，经济因素亦是重要原因，限于篇幅，他文另论。

参考故宫博物院王祎先生对赵孟书碑时间的分期<sup>[3]</sup>，李舒、解小青对赵孟书风发展的整理<sup>[4]</sup>以及笔者对赵孟在江苏书碑情况的梳理，本文将赵孟江苏碑刻书法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308年之前）、中期（1309-1315）和后期（1316-1322）。目前可见的大部分赵孟江苏碑刻书于中、后期。

## 二、赵孟江苏碑刻书法早期作品及其特色

赵孟早期江苏碑刻见于著录的有《范文正公义学记》<sup>[5]</sup>《范文正公忠烈庙记》<sup>[6]</sup>等，现存以《居竹记》和《松江宝云寺记》最为著名。需要说明的是，松江虽现属上海，但缪荃孙著《江苏金石记》时，松江尚属江苏，因而收录了《松江宝云寺记》，本文从之，亦将《松江宝云寺记》等列入本文讨论范畴之内。另外，根据书风，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加封孔子制诰碑》（1307）虽未署名，但当为赵孟这一时期碑刻书法<sup>[7]</sup>。

《居竹记》书于大德二年（1298年）二月初八，“通议大夫前建德路总管兼府尹紫阳方回记，前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吴兴赵孟书”<sup>[8]</sup>，缪荃同男文善摹刊<sup>[9]</sup>。碑文是善论诗文的方回应妻弟曹和甫仲达之邀而作，和甫欲“刻扁其书室曰居竹”<sup>[10]</sup>，便请时年七十一岁的方回操刀，方回的文字优美流转，强调士需志行高尚、为人之子需能承

<sup>2</sup>[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2]（清）叶昌炽编：《语石》十卷，《石刻史料新编》二辑第十六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1873-11874页。当然，对赵书评价亦有相反说法，如祝嘉《书学史》“元朝之书学”即为一例：“然是代书家，未有出子昂之右者；其他守辙循涂，未能出其肘下。”“子昂之在元，亦尤晋之二王，唐之欧虞；然气魄殊弱，以之继统，亦尤偏安之小朝廷，非泱泱大国之规模矣。史虽称其于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然纤弱妩媚，乃斫草拈花之技耳，未足以语大也。”见祝嘉《书学史》，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版，第302页。

[3]王连起：《赵孟及其书法艺术简论》，（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第47页。

[4]王祎：《元碑不出吴兴外：赵孟书碑浅说》，（北京）《紫禁城》2017年第8期，第111页。

[5]（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元）方回：《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元）杨载撰、钱伟疆点校：《赵公行状》，《赵孟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22页。

[8]（元）赵孟：《天冠山题咏二十八首》之《鬼谷岩》，《赵孟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sup>3</sup>[1]（元）佚名：《庙学典礼》卷一《官吏诣庙学烧香讲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元）郑元祐：《重修平江路儒学记》，《侨吴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担家事，并引用苏东坡“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sup>[1]</sup>，道出了些许对文人志行高洁的期待。碑文则由赵孟书。也正是这一年，赵孟被元成宗召回大都抄金字藏经，方回作《送子昂提调写金经》记录了这一对孟来说极为重要的事件，并对赵孟书法给予极高评价：“天下善书今第一”<sup>[2]</sup>。方回的岳丈曹应符<sup>[3]</sup>是画家曹知白的从叔，而赵孟和曹知白是忘年交，陶宗仪（1329-1410）《曹氏园池行》言曹知白“翁之交游皆吉士，赵邓虞黄陈杜李”<sup>[4]</sup>，赵孟列于曹知白交游之首位。因而，《居竹记》的书写极有可能是方回邀请赵孟书丹，也可能是曹应符通过曹知白请求赵孟挥毫。相较而言，前者可能性更大。由此亦可推知，曹应符、曹知白、方回、曹和甫和赵孟都有交往，因此，方回为曹和甫《居竹记》撰文、赵孟为之书丹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方回、赵孟和曹知白也因《居竹记》缔造了一个更为紧密的诗文、书写与交往的文友圈。

《居竹记》碑拓早已漫漶不清，书体基本相当于赵孟同时期行书书风。从隐约可见的一些字迹里可窥其书风已有李邕（678-747）《李秀碑》端倪，横画尤似，如“先”之横画。但就整个字而言，《李秀碑》所书更具开合之感，《居竹记》则紧凑内敛些。此外，《李秀碑》中“之”字与《居竹记》中“之”字、《李秀碑》之“守”字与《居竹记》之“家”字在用笔和结体方面皆有相近之处。唯有《李秀碑》中“九”字有写经体特征，而《居竹记》之“九”字则显得纯熟端正。《李秀碑》书于公元742年，书法笔画骨力内含，其书虽得力于“二王”，但用笔豪迈厚重，王羲之的儒雅书风外融入了碑意中的严谨刚健，表现出精熟的用笔技巧，横画、竖画多用方笔，拓宽了我国碑铭书体的新途。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此碑在书法发展史上具有一定意义。不同的是，李北海书法乏于江南书家的含蓄空灵，代之以苍茫强劲，暗合盛唐气质；而赵孟取其结体，又多了些灵秀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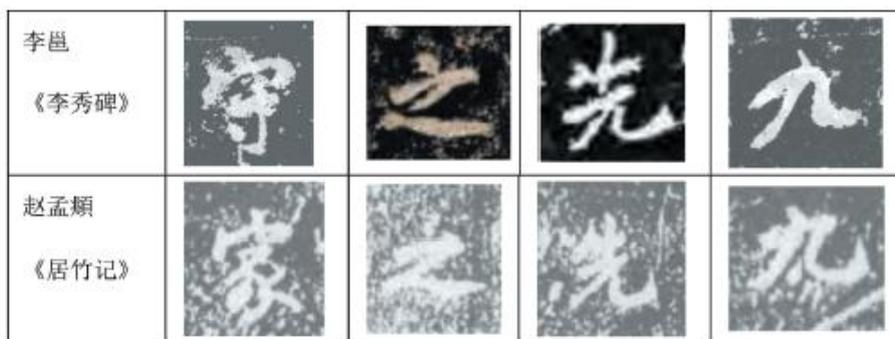


图1 李邕《李秀碑》与赵孟頫《居竹记》剪字对比

大德三年（1299年）八月，赵孟任“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sup>[5]</sup>。到至大二年（1309年），他在杭州官江浙行省等处儒学提举十年之久。这也正是赵孟潜心研究书法的十年，求书碑刻者益多。赵孟在浙江、江苏、上海一带书写了大量碑刻，书于至大元年（1308年）的《松江宝云寺记》即是其中之一，为“前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巘撰，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赵孟书，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廉密知儿海牙篆额”，释净月立石<sup>[6]</sup>。明陈继儒《妮古录》载：“子昂亭林碑，其真迹曾粘村民

[3]王祚将赵孟书碑分为三个时期：大德二年（1298年）之前、大德二年（1298年）至至大元年（1308年）、至大二年（1309年）至至治二年（1322年）。参见王祚：《元碑不出吴兴外：赵孟书碑浅说》，（北京）《紫禁城》2017年第8期。

[4]李舒将赵孟行草书分为五期：初学期（1283之前）、过渡期（1284-1299）、成熟期（1299-1310）、巩固期（1310-1316）、高峰期（1317-1322）。参见李舒：《艺术巨匠·赵孟》，（北京）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4-169页。解小青将赵孟书法划分为早期（1301年之前）、中期（1301-1310）、中晚期（1310-1316）、晚期（1316-1322）。见解小青《赵孟书法艺术》，《赵孟法帖品珍》，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第8-15页。

[5]（明）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明）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图见应征：《镌石印痕：环太湖历史碑刻拓片精萃》，（北京）中国书店2013年版，第37页。

[8]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

[9]“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八录作‘云间缪奎同男文正摹刻’。‘文正’、‘文善’孰是孰非，未见碑石，不能遽定。但新标点本《嘉定钱大昕全集》此处断句作‘云间缪奎同、男文正摹刻’，以‘同’字属上读，则显系因未明刻工题署之例而致误。”见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10]（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五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8973页。

[1]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

[2]（元）方回：《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屋壁上，王野宾买之以转售项氏”<sup>[1]</sup>。其后流传情况不详。清末民初时被制成影拓本，广为流传。《松江宝云寺记》记述了松江宝云寺的历史沿革以及元代住持净月重修寺院的情况，碑文为宋时大理少卿而入元不仕的牟巘（1227-1311）所撰。赵孟与牟氏一门交游密切，与牟巘更是至交，牟巘曾为子昂《文赋》做过题跋，对其书法赞赏有加：“子昂书士衡文赋，曲尽变态。词之妙固有以发之亦未尝不资乎？字之妙而交相发也。”<sup>[2]</sup>牟巘也为子昂写过《简赵子昂君》《十日菊为子昂寿》《别赵子昂》《十七日谢赵子昂孟能静及诸亲友》等诗作。牟巘和赵孟的文、书合作甚富，除了《松江宝云寺记》外，还有如《湖州妙严寺碑记》<sup>[3]</sup>《嘉兴重修儒学记》<sup>[4]</sup>《嘉兴路儒学碑》<sup>[5]</sup>《忠烈庙记》<sup>[6]</sup>《平江府重建三清殿记》《玄妙观重修三门记》<sup>[7]</sup>等。大德元年（1297年），赵孟手书《牟巘诗卷》。牟巘去世，赵孟又亲自撰写《牟巘墓志铭》<sup>[8]</sup>。赵孟与牟巘子应龙交谊深厚，时常唱和，同被列入“吴兴八俊”。

此碑为行书，书风在一定程度上受《集王圣教序》影响，如“大”“书”“十”等字，点画精美、骨肉匀亭、体势秀劲谨严。大德中期到至大年间，赵孟的书法面貌已脱去早年学习高宗、米芾等形式，效法晋人，变入北海，逐渐确立个人风格并进入新的创作阶段。此外，《松江宝云寺记》书风亦得力于位于南京市栖霞镇新合村甘家巷的《萧愔碑》书风。萧愔墓石碑约立于梁朝普通三年（522年），碑额上书“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十七字，为历代书家所瞩目。该碑为东海徐勉撰文，吴兴贝义渊书写，都元上石，丹阳房贤明刻字。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评《梁始兴忠武王萧愔碑》曰：“与《刁遵》同体，茂密出元常。而改用和美，几与今吴兴书无异。而笔法精绝，如有妙理。北朝碑实少此种。惟《美人董氏志》，娟娟静好略近之。至唐人乃多采用，今以吴兴故，千载盛行。今日作赵书者，实其苗裔，直可谓之《刁遵》体也。”<sup>[9]</sup>南海所论“与《刁遵》同体”“几与今吴兴书无异”，乃据《萧愔碑》碑额书风所言。《松江宝云寺记》笔势开阔放纵，颇有新姿。



图2 《集王圣教序》与赵孟頫《松江宝云寺记》

综上，赵孟早期江苏碑刻书法处于师法“二王”、南朝和李邕书风阶段，初现师李北海渐成之态。从中可以感知赵孟在书碑之余，对前代碑刻书法的仔细梳理和研究，从而呈现出秀丽劲健的碑刻书法面貌。

[3]（明）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三一《居竹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29-730页。

[4]（元）陶宗仪：《南村诗集》卷一，明元人十种诗本。

[5]（元）杨载撰、钱伟疆点校：《赵公行状》，《赵孟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22页。

[6] 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记》卷二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491页。赵孟所书《松江宝云寺记》有两个版本，一为墨迹本，一为碑拓本。两版本稍有不同，但属同宗。本文用图采用墨迹本，见王连起、郭斌《赵孟墨迹大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83-97页。

[1]（明）陈继儒：《妮古录》卷一，明宝颜堂秘籍本。

[2]（清）张照：《石渠宝笈》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明）汪何玉：《珊瑚网》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九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明）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明）钱谷：《吴都文粹连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

[8]（元）虞集：《牟伯成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第116页。

[9] 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辑注》卷四“体系第十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15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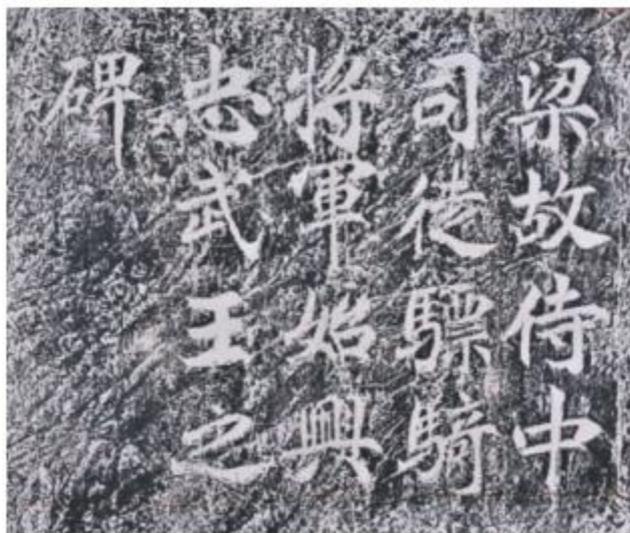


图3 《梁始兴忠武王萧愔碑》碑额拓片



图4 赵孟頫《松江宝云寺记》(局部)

### 三、赵孟江苏碑刻书法中期作品及其特点

赵孟江苏书碑中期作品有：《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李愿归盘谷序》《崇禧万寿宫记》《三重修儒学记》《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碑》等。其中不少书碑都反映出赵孟在江苏的活动与交往，是书法史的重要资料。如书于至大二年（1309年）的《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前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承务郎周驰撰，前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赵孟书并篆额”<sup>[1]</sup>。周驰与赵孟同朝为官，是“一日不见如三秋”“交情子都亲”的好友<sup>[2]</sup>，又皆是文士、汉儒、书法家、诗人。周驰常与赵孟合作，一并受邀为官宦贤达撰写家传、祠记和碑文，两人合作完成《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后，次年，周驰又为北京通州李姓高官撰写《闲邪公家传》，也是赵孟以正书书写。大散文家撰文，大书法家书写，堪称双璧<sup>[3]</sup>。

与《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时间相近的《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由“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姚燧（1238-1313）撰，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赵孟书并篆额”<sup>[4]</sup>。因赵孟至大二年（1309年）七月，除扬州路泰州尹；次年十月，拜翰

林侍读学士，故立碑时间也在至大二年（1309年）到至大三年（1310年）间。此时，恃才放旷的文学家姚燧也正处于仕途的巅峰之时，姚燧的伯父姚枢（1201-1278）和老师许衡（1209-1281）皆深受忽必烈赏识。珊竹氏与成吉思汗家族“同源而殊流”，家族地位显赫。珊竹公拔不忽为北京马都元帅吾也而之孙，曾请名儒张翥、吴澄（1249-1333）教其子，至大元年（1308年）十月卒。而吴澄和赵孟一同被举荐至大都，是互相欣赏的好友，因而此碑由赵孟书丹，应是吴澄的引荐。因而，此碑可谓集当时最高文学水准与书法造诣于一体，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碑主在当时的特殊身份。《珊竹公碑》书法笔势圆劲流丽，于庄严规整中见潇洒飘逸，可以看出赵孟对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告身帖》、褚遂良《圣教序碑》、李邕《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黄庭坚《跋苏轼〈黄州寒食诗卷〉》的研习和师法<sup>[5]</sup>，用笔与《湖州妙严寺记》相似。《湖州妙严寺记》书于至大二年（1309年）至三年（1310年）<sup>[1]</sup>，与《珊竹公碑》书写时间相近，牟巘撰文，整卷精巧工致、高古婉媚、深厚纯熟；字形方正宽窄、扁平瘦长兼有；结体富于变化，更多采用李邕书法中向右上倾斜的结构，运用方折、斜笔等，又有些许含蓄的魏碑意味<sup>[2]</sup>。明初姚绶（1422-1495）曾受法师雨庵大霁之邀四度为《湖州妙严寺记》题跋，赞赵孟书法“端雅而有雄逸之气”，“其意欲托之金石”，认为赵书“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通之天下”<sup>[3]</sup>。《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从诞生之时，就颇受推崇，以至明代时已经因为“摹拓者众”而“下方渐泐”<sup>[4]</sup>了。

赵孟于皇庆元年（1312年）书写了韩退之的《李愿归盘谷序》<sup>[5]</sup>，此时正值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朝。《李愿归盘谷序》文辞优美，不乏“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的美句，也绘出世外桃源般的净土——“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维子之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这当是赵孟愿意终其生以徜徉的精神家园。碑文后有子昂跋语：“昆山顾善夫涉吾游甚久，于口颇信实而又好学，时时求吾书持归刻石，故吾亦乐为之书。皇庆元年，吾在集贤，善夫以公事至都下，复来相寻，求书此文，不忍却也。夏四月九日，子昂。”<sup>[6]</sup>其时赵孟年五十九岁，在京任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顾信（1279-1353）是赵孟的弟子，也是赵书的热心收藏者，每得赵书，必嘱良工镌刻上石。顾信将赵书摹刻上石、制成碑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赵书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李愿归盘谷序》外，顾信于至大三年（1310）创建昆山淮云院后，还请赵孟书丹过《昆山淮云院记》<sup>[1]</sup>，行书，笔墨精妙，册前附有淮云院绘图及赵孟之画像，册后亦附有绘图、收藏者画像及题跋等，书风“犀利之中姿态横生”，与赵书《佑圣观重建玄武庙碑》《珊竹公碑》相仿佛，在学王羲之的基础上，吸收李可邕、柳公权等书家方法<sup>[2]</sup>。《昆山淮云院记》结体偏长笔力峻拔，中宫紧收而笔画舒展，多用方笔，转折搭笔处锋棱俱见，注重字势的挺拔和庄严大度，艺术特征鲜明<sup>[3]</sup>。

<sup>[1]</sup> [4] 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第492页。

[2] （元）赵孟：《松雪斋集》卷四《赠周景远、田师孟》《和周景远见寄二首》。

[3] 关于周驰相关问题考证，参见赵振乾：《元代书法家周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书法》2015年第8期。

[5] 方闻：《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李维琨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134页。

<sup>[1]</sup> [1] 关于赵孟书《湖州妙严寺记》的时间考察，见姜一涵：《赵孟湖州妙严寺记》，（北京）《故宫季刊》，1976年第3期。《湖州妙严寺记》，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

[2] 孙志新：《名留青石：赵孟的晚年及其碑铭楷书的形成与发展》，载（北京）故宫博物院编：《2017年赵孟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1页。

[3] （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3-694页。

姚绶《夜行诗十首》结体端秀方正，以行入楷，深受赵氏《湖州妙严寺记》大楷碑书的影响。

[4] （明）申嘉瑞：《（隆庆）仪真县志》卷二，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5册，上海书店1971年版，第17页。

[5] 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页。

[6] 拓片见朱巍：《江苏太仓的赵孟书碑》，《书法丛刊》2009年第1期。



图5 赵孟頫《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册》拓本(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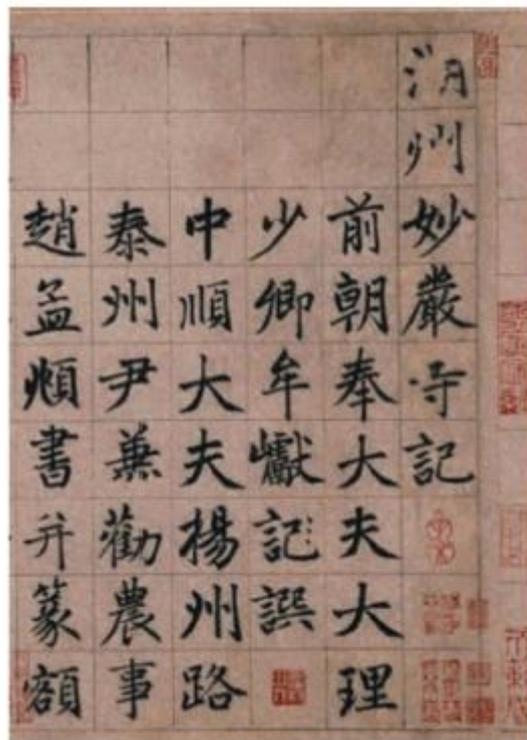


图6 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拓本(局部)

综上，赵孟頫江苏碑刻书法中期作品端雅雄逸，是赵书“由中年姿媚圆活向晚年苍劲雄放风格转变的过渡期”<sup>[4]</sup>，此期作品以

二王笔法为基础，同时兼收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和黄庭坚等笔意，尤其是对李邕书法理解更为纯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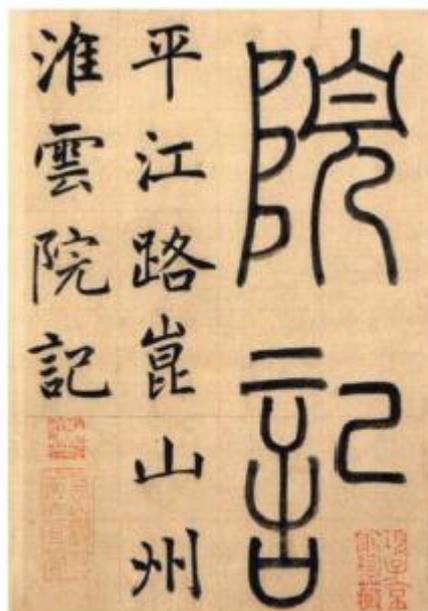


图7 赵孟頫《昆山淮云院记》(局部)



图8 赵孟頫《佑圣观重建玄武庙碑》(局部)

#### 四、赵孟頫江苏碑刻书法后期作品及其特点

赵孟頫江苏书碑后期作品有：《大报国圆通寺碑》<sup>[6]</sup>《重建泛海观音殿记》《崇禧万寿宫记》《三重修儒学记》《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碑》等。

《大报国圆通寺碑》书于延祐六年（1319年），“翰林学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撰并书，推忠揆义协谋佐运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尉上柱国驸马都尉王王璋篆额”<sup>[6]</sup>，住持沙门“妙明圆悟普济佛心大禅师”明了立石，嘉庆时尚在。此碑的诞生，将元代的三个身份相异的人凝聚在一起，造就了碑刻史上的一段美谈。明了禅师是宋代设嘉定县时的首任知县高衍孙之裔孙，圆通寺是其故宅，当地的大吉祥皇庆寺、大资福寿宁尼寺也是明了禅师所建<sup>[7]</sup>。元朝蒙古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推崇藏传佛教，寺、庙一时蔚为大观，圆通寺即为其一。赵孟在碑文中叙述了大圆通寺的由来，中有“道何物耶？依之而心修从之而理顺。德何物耶？布之而利博积之而行圆。返斯二者，则圣贤不取焉。伽蓝者，着明道德之大宅也”的警句，也阐明了“圆通”的由来。篆额者高丽国王王璋（1275-1325）是高丽第二十八代国王，其母为忽必烈之女，元朝通过在高丽扶植亲元势力、联姻、设立征东行省等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政局，王璋就是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其一生的政治起落表明高丽王在元朝政局中的地位和立场，对于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sup>[8]</sup>。除此之外，王璋也是很多文化活动的主导者，王璋曾在元朝“构万卷堂于燕邸，招致大儒阎复、姚燧、赵孟、虞集（1272-1348）等与之从游，以考究自娱”<sup>[1]</sup>，此碑也恰好是王璋和赵孟交游的一则例证。两人交谊甚深，一起“画屏摘句写乌丝”<sup>[2]</sup>，王璋将赵孟书法带回高丽，成为高丽士大夫学习的对象<sup>[3]</sup>，对赵孟书法传到高丽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碑为行楷，较之前碑刻书迹，字迹完善、成熟，笔力浑厚，书法圆劲，形式上也更多变化<sup>[4]</sup>。清代钱大昕观摩赵孟此碑，被深深吸引，如痴如醉，数度摩挲，“移时不去”<sup>[5]</sup>。



图9 赵孟頫《大报国圆通寺碑》中出现的不同“圆通”



图10 《重建泛海观音殿记》中的不同“观”字

书于延祐七年（1320年）二月的《重建泛海观音殿记》，由“前进士胡应青记”，“赵孟书并篆额”，“光妙严大师住山祖暉立石”<sup>[6]</sup>。文中讲述了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创建的暨阳乾明广福禅刹由住持僧南山祖师化缘“撤旧营新，栋隆宇壮，丹楹藻

<sup>[1]</sup> 全图载于《赵孟书画全集》第二卷“楷书昆山淮云院记册页”第20-71页。  
<sup>[2]</sup> 王连起：《传世赵孟书道教碑真伪考》，（北京）《文物》1983年第6期。  
<sup>[3]</sup> [4] 王连起：《赵孟及其书法艺术简论》，（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  
<sup>[5]</sup> 如前，嘉定现在属上海，缪荃孙著《江苏金石记》时，嘉定尚属江苏，因而收录了《大报国圆通寺碑》。本文统计时亦从之。  
<sup>[6]</sup> 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页。  
<sup>[7]</sup> 潘明权、柴志光：《上海佛教碑刻资料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  
<sup>[8]</sup> 薛磊：《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高丽忠宣王王璋》，（呼和浩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年第3期。  
<sup>[9]</sup> [1] 郑麟趾：《高丽史》卷三四《忠宣王世家》，《朝鲜社科院古籍研究所刊本》，1958。  
<sup>[2]</sup> 赵孟：《留别沈王》，《松雪斋集》。  
<sup>[3]</sup> （朝鲜）徐居正：《笔苑杂记》，卷一。  
<sup>[4]</sup> 拓本见《赵松雪墨宝：大报国圆通寺记》，（上海）广益书局1958年版。  
<sup>[5]</sup>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五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8982页。  
<sup>[6]</sup> 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

悦”的过程，落成当日，“芻云滃空，士女趋庆”，文中亦有“匪观以音，观以心尔，法界唯心，心心相照”之悟语。碑刻下截具载施主名衔，如“都劝缘朝散大夫江阴州达鲁花赤兼劝农事速安答失助钞壹拾定、昭勇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戸府达鲁花赤脱脱助钞伍定、定远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戸府万天口口撒儿助米贰拾石”等，施主中既有怀远大将军、宣武将军、太师右丞相下总管蔡资同妻刘氏、申浦王大孺人余氏等，也有本寺居士张觉真暨同修常氏妙净喜、寺中住持南山等。故而此碑对研究元代官职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生动地揭示出寺院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胡应青比赵孟大十余岁，两人皆信佛，所以由赵孟择其文中部分内容，书写了这篇《观音殿记》，流传于世。赵孟书写时，没有全文照录，而是从“殿多历年”开始，舍去了前后叙述，只取两百余字精华。胡应青为1271年进士，后到江阴做县尉，重修寺庙，立此碑，并特意请赵孟书写，也促成了一块名碑的诞生。碑文清晰可读，字体遒劲端庄，有些许李邕、黄庭坚笔法，体现了赵孟书法的较高境界，文中多次出现“观”字，形态各异，体现了书者在章法结体方面的思考与实践。

此外，书于至治元年（1321年）的《崇禧万寿宫记》，由“江左邓樟材镌字，宏道明真冲靖真人同主领三茅山诸宫观掩住持崇禧万寿宫事陈志新立石”，王去疾文，赵孟书并篆额<sup>[1]</sup>。崇禧万寿宫，位于茅山华阳南门之东。此碑不仅是研究茅山道观历史沿革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赵孟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据碑文推算，此碑系赵孟暮年作品，其时已六十七岁，疾病缠身。碑成后第二年夏，赵孟去世。此碑是将楷、行、草三体书糅合于一体的精心之作，结体俊美灵秀，匀称优雅，有二王韵致、李邕体态，纵放连绵，也略有力不逮意之感<sup>[2]10</sup>。



图11 《重建泛海观音殿记》拓本

<sup>10</sup>[1] 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517页。

[2] 刘宇恩：《历代拓本精华》“赵孟书茅山崇禧万寿宫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

---

综上，赵孟江苏书碑后期作品较之前碑刻书迹相比，进入了更为圆融的境界，有些许李邕、黄庭坚笔法，书法圆劲优美，结体俊美灵秀，字迹完善成熟、遒劲端庄、匀称优雅，体现了赵孟书法的个人特色和艺术境界。

## 结语

在江苏碑刻中，就书法史研究层面，赵孟书碑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赵孟江苏碑刻早期书法处于师法“二王”、南朝和李邕书风阶段，对前代碑刻书法能钻研摸索，秀丽劲健；中期作品端雅雄逸、苍劲雄放，以二王笔法为基础，同时兼收褚、颜、柳、黄等笔意，尤其是深刻理解李邕书法；后期作品则进入了更为圆融通达的境界，圆劲优美、遒劲端庄、灵秀优雅，体现了赵孟碑刻书法特质。不能不说，赵孟逐渐完善的碑刻书法创作和他的“复古”实践一样，深刻影响了后代书法发展，而赵孟江苏碑刻书法中呈现出的李邕风格本身也是“复古”风尚的一部分。作为有元一代最为重要的书家，赵孟江苏碑刻书法显示出赵孟在江苏的部分活动及其特点，在彰显赵孟书法形式各阶段的特征与变化的同时，也昭示出赵孟在江南浸润儒学理学的成长和交往。这是赵孟艺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这些碑刻展示了赵孟与官员兼诗人的方回、入元不仕的牟巘、同朝为官的周驰、恃才放旷的文学家姚燧等江南名士的文、书合作。赵孟也得到了顾信等江南士人对其学问与书法水准的认可，顾信将赵书摹刻上石、制成碑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赵书的传播和接受。这些共同促成了江南碑刻书法整体形象的形成和发展，也留下了一段抹不掉的历史。而高丽王王璋凭借个人地位和影响力，对赵孟书法传至高丽乃至更广阔的区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